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5.013

论《元经》的史学价值

李正君, 张碧林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 隋代王通所作《元经》, 在编撰方面具有叙述的贯通性、材料的简明性、正统的凸显性以及《春秋》的比拟性等突出特点。其保存了一些《晋书》没有的史料、一些与《晋书》不同的史料; 这些史料可以与《晋书》互勘互证, 具有一定的价值, 值得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元经》的史学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关键词: 《元经》; 《晋书》; 编撰特色; 史料价值; 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3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5-0102-06

引用格式: 李正君, 张碧林. 论《元经》的史学价值[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5): 102-107.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Yuan Jing*

LI Zhengjun, ZHANG Bi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China)

Abstract: *Yuan Jing*, written by Wang Tong in Sui Dynast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herence of the narrative, the conciseness of the materials, the prominence of the orthodoxy, and the analog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its compilation. It has preserved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are not found in *the Book of Jin*, and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Book of Jin*;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can be cross-checked and cross-corroborated with those in *the Book of Jin*, which are of certain value and worthy of further sorting out and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value of *Yuan Jing* deserves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Yuan Jing*; *The Book of Jin*; compilation features; historical material value; historical value

《元经》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比拟《春秋》所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始于西晋惠帝太熙元年,终于陈亡。因其成书于隋代,较之正史为早,又因王通及《元经》在历史记载上存在一些缺失和讹误,故其真伪性一直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直至近些年,《元经》的真实性才得到学术界的

普遍认可^[1]。学界对《元经》的史学价值关注较晚,整体关注不够,目前尚无高质量的《元经》点校本问世。

《元经》的作者王通,字仲淹,隋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隋开皇四年(584年),卒于隋大业十四年(618年),死后,门人谥为“文

收稿日期: 2023-05-09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元经》整理及相关研究”(AHSKQ2019D129)

作者简介: 李正君(1989—),男,安徽淮南人,安庆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中子”，是隋代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和史学家。王通在隋代时默默无闻，《隋书》和两《唐书》也不曾为他立传。到了宋代，学界开始慢慢重视王通的学术贡献，甚至将其与孟子并列。本文拟从《元经》叙述的贯通性和材料的简明性、正统的凸显性与《春秋》的比拟性以及史料价值等三个方面阐释《元经》的史学价值，以期推进《元经》的研究。

一、叙述的贯通性与材料的简明性

《元经》一书最初以经的形式出现，其内容则

是历史记述。全书记载时段较长，但语言十分精炼，其中许多材料经过了王通的选取、采摘。加上薛传的部分，全书共 13 万余字。《元经》通篇体现出贯通性和简明性的特征。

1. 叙述的贯通性。《元经》的叙述时段，上起西晋惠帝时期，下至陈亡，时间跨度较长，其叙述详略分明；其中，西晋史实占 2 卷，东晋史实占 5 卷，刘宋史实占 1 卷，第九卷时间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 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具体时段如表 1 所示。

表 1 《元经》各卷断限表

卷数	起年	止年	时间
卷一	西晋惠帝太熙元年(290 年)	光熙元年(306 年)	17 年(惠帝)
卷二	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 年)	愍帝建兴五年(317 年)	11 年(怀、愍)
卷三	东晋元帝太兴元年(318 年)	明帝太宁三年(325 年)	8 年(元、明)
卷四	成帝咸和元年(326 年)	咸康八年(342 年)	17 年(成)
卷五	康帝建元元年(343 年)	废帝太和六年(371 年)	29 年(康、穆、哀、废)
卷六	简文帝咸安元年(371 年)	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 年)	26 年(简文、孝武)
卷七	安帝隆安元年(397 年)	恭帝元熙二年(420 年)	24 年(安、恭)
卷八	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 年)	顺帝昇明三年(479 年)	60 年(刘宋一朝)
卷九	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 年)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	110 年(北魏、西魏、北周、隋文帝)
卷十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 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	29 年(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

可见，《元经》对于两晋尤其是东晋历史的撰写最为详尽，而刘宋一朝和北朝的记载只各占一卷。前揭皮日休《文中子碑》记“《元经》三十一篇”，查今本《元经》只十卷(卷十题为薛收补)。又因《元经》以编年史体例书写，刘宋及北朝虽所占篇幅较少，但年代年号却十分完整，只是许多年号之下并未记载任何史实，不知何故。尹协理认为，今本《元经薛氏传》是有残缺的^[2]。胡克森认为：“王通撰写《元经》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分裂时期树立一个新的正统，而这个正统就是北魏。”^[3]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大体可以解释王通在《元经》中利用大量的篇幅书写两晋及刘宋的历史，而对于王通树立的新正统(北魏)却记述十分简略的原因。王通企图借助《元经》阐释天下正朔由两晋刘宋传承至北魏的过程，以此来突显北魏的正统性，故而对正朔传承的过程，即两晋刘宋的历史演进记载得更为详尽。由此可见，《元经》创作旨在阐释正统的传递，而不在历史史实的记述。从这个方面来说，《元经》作为经的意义更加突出，其史学功能则是传经产生的客观效果。换言之，《元经》的历史记述只是手段，确立新的正统才是其

目的。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元经》涵盖整个两晋南北朝及隋文帝时期，史实叙述的贯通性强。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历史演进的脉络，也是王通修《元经》的一大特色。

2. 材料的简明性。《元经》发挥了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每年之下所记载的史实十分简明。如《元经》卷六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条：

太元二十一年春，帝正月。夏四月，慕容垂死，子宝嗣立。六月，吕光僭王。秋九月，庚申，帝醉，自崩^{[4]247}。

相比之下，同年《晋书》帝纪中对此的记载更为详细：除包括《元经》记载的相关内容外，还包括造清暑殿、慕容垂进攻平城、作永安宫以及孝武帝崩于清暑殿等内容，并追述孝武帝幼年数事，兹不赘引。《晋书》帝纪部分叙述较《元经》更为详细，如再加上“志”与“传”中的历史细节，其内容更为详实，由此也更能凸显出《元经》叙事简明的特征。《元经》旨在大体勾勒王朝更替、治乱兴衰的过程。

又如《元经》卷七东晋安帝“隆安三年”条：隆安三年春，正月。二月，林邑陷日南、九真，

遂寇交趾,交趾太守杜瑗讨破之。段业自称凉王,仇池公称藩。三月,尊陈夫人为皇后。夏六月,慕容德陷青州,杀辟闾浑。秋八月,秃髮乌孤死,弟利鹿孤立。冬十月,秦姚兴陷洛阳。十一月,妖贼孙恩陷会稽。十二月,桓玄袭江陵,杀殷仲堪、杨佺期,梁吕纂杀吕绍自立^{[4]249}。

而《晋书·安帝纪》则补充了正月封宗室蕴为淮陵王,二月河间王国镇去世,四月颁布的人事任命,以及本年荆州大水等数事,所述事件更加详细,连贯性更强。

再如《元经》卷九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条:

武泰元年,帝崩。尔朱荣弑帝钊,别立子攸,改元永安^{[4]262}。

《元经》于每月之下多则记述一两条史实,少则只有月份,并无任何内容,记述内容也是简明扼要。不过,其选取材料的种类十分丰富,政治事件、官员任免、战争冲突、符瑞灾异、民族外交、宫城修缮、大臣逝世等无所不包。《元经》的撰写比拟孔子的《春秋》。《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前后242年的历史,《春秋》只用了18000余字。王通也企图用简约凝练的文字,勾勒出历史的发展脉络,宣扬自己的正统史观,其在简明之余,仍能做到严谨和规范。

二、正统的凸显性与对《春秋》的比拟性

《元经》是王通“续六经”中的一部,其效仿孔子《春秋》而作。由于叙事的简明性,其历史记录的功能不太明显,其中蕴含的正统观念是其突出的特点,也是研究隋唐正统观及王通政治思想的重要参考。

1. 正统的凸显性。从内容上说,《元经》的内容多取材于当时已存的相关史书,且与正史记载多有重复。其中所宣扬的正统观念,是王通作《元经》的主要动因。《元经》是研究王通个人正统思想乃至隋代正统观演变的重要参考文献。从《元经》的叙述顺序来看,第八卷为刘宋一朝的历史;第九卷并没有按照南朝的朝代更迭顺序编写下去,而是从南朝走入了北朝,开始叙述北魏的发展;其对北魏历史的讲述也并非从北魏开国开始,而是从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开始。关于太和四年这一时间节点,祝总斌先生认为,王通的

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肯定北魏王朝在南北对峙中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是为了给他的四世祖弃齐奔魏,叛华夏而投戎狄,子孙又仕魏、周、隋这一系列行为的正义性,以及隋王朝的正统地位,寻找历史和儒家经典的根据”^[5]。可见不管于公于私,在王通看来,自刘宋灭亡之后,天下的正统就归于北魏了,这同时也解释了《元经》第九卷只记西魏北周年号而并无东魏北齐年号的原因。对于北魏正统性的认识,王通曾有这样的表述:

文中子曰:“或问孝文。”子曰:“可与兴化矣。”又曰:“中国之道不替,孝文之力也。”又曰:“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有法矣。”又曰:“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董常问:“《元经》之帝魏,何也?”子曰:“乱离瘼矣,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子曰:“《元经》之专断,盖禀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帝都洛,造明堂,置职制,凡诏策,帝自述之。”^{[4]261}

《中说》中亦保留了一段王通之弟王凝对于《元经》“帝魏”的解释:

子述《元经》皇始之事,叹焉,门人未达。叔恬曰:“夫子之叹,盖叹命矣。《书》曰:‘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子闻之曰:“凝,尔知命哉!”^{[6]4}

皇始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年号,历时两年,皇始元年(396年)即东晋安帝太元二十一年。《元经》薛氏传序也说:“然帝衰于太熙,故《元经》首此振起之也。中国盛乎皇始,故《元经》挈名以正其实。”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王通认定北魏正统性的基本依据:第一,王通评价“太和之政近雅”,又说“天地有奉”,“受先王之道”,“造明堂,置职制”,即能够奉行儒家的传统礼制,能够实现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理想。第二,“生民有庇”和“黎民怀之”,即能够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这也符合儒家“民为贵”的主张。第三,“居先王之国”和“帝都洛”,在地域上北魏占领传统中原地区,因而其在地域上也占据正统地位。同时,王凝以《尚书》作为依据,认为即使是戎狄,只要有德,天命仍然可以攸归。在王通的心中,正统的谱系应该是:西晋—东晋—刘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元经》从第九卷开始,完全以北魏作为正统单独叙述,由北魏

进而至西魏、北周,最后到隋代,将此过程中南朝的齐、梁、陈以及北朝的东魏、北齐都视为僭越的闰统王朝。

2. 对《春秋》的比拟性。《续六经》是为承接儒家传统的六经而作,而《元经》则是为了比拟《春秋》而作,在《元经》和《中说》中保留了很多将《元经》与《春秋》相互比较的内容。如《元经薛氏传序》

《春秋》,一国之书也。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经》,天下之书也。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春秋》抗王而尊鲁,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经》抗帝以尊中国,其以天命之所归乎^{[4]213}。

《元经薛氏传》为文中子弟子薛收所作,不免有对其老师的溢美之词。薛收认为《元经》比《春秋》的政治意义更加宏大,《元经》已经跳出了一国一姓的范围,讲述的是整个天下的大势。

又如《中说》中王通与弟子的多段对话,都表明了《元经》与《春秋》的关系。《中说》卷一《王道篇》:“文中子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可不兴乎?’薛收曰:‘始于晋惠,何也?’子曰:‘昔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6]3-4}又“子谓叔恬曰:‘汝也《春秋》《元经》乎?《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6]27}又《礼乐篇》:“子谓薛收,贾琼曰:‘《春秋》《元经》,其衰世之意乎?义直而威,言曲而中。’”^{[6]58-59}

从写作动机看,王通撰写《元经》是为了代行赏罚,试图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起到同样的效果。王通的弟子们也将王通摆到了与孔子等同的位置上,所谓“前圣,后圣,一也”。从实际内容看,《元经》也继承了《春秋》微言大义、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春秋》的“史法”在《元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谓‘史法’,

则是指运用特定的书法形式来褒贬史事,彰显史义,后人称为‘《春秋》笔法’。”^{[7]55}如阮逸注《元经》称“《元经》贬恶其义,权衡轻重,各有所存,是以有书名而去姓者,有书姓名而去宦者,前后别例各不同,传释之详矣”。又称“《元经》凡书姓名及称官者,皆无贬。《元经》,始事也。下文书薨,盖终其善。有不书薨者,则有讥焉”^{[7]55}。兹举三例如下:

《元经》卷一西晋惠帝“元康六年”书:“冬十一月,命周处讨氏贼,关中饥,大疫。”薛氏传曰:“周处者,为建威将军,诏讨齐万年,禀梁王彤节制,书人不书官者何?曰:‘《元经》之法,人名重,官任轻,则书名。以明人贤任卑也。书官不书人者,不贤也,有书人,则因旧史常制,无所轻重也。’”^{[4]216}周处只称名不称官职,是因为周处贤,任职较轻,以此来称赞周处。

《元经》卷一西晋惠帝“元康八年”书:“秋九月,刘卞废贾后,不克。”薛氏传曰:“刘卞者孰谓?曰:‘愍怀太子卫率也。’卞潜知贾后欲废太子,乃告司空张华曰:‘东宫俊彦如林,四率精兵万数,公居阿衡,废贾后以安晋祚,可乎?’华不能,故书曰‘刘卞废贾后’,褒忠于晋祚也。不克者,贬华不能行也。《春秋》以一字褒贬,须数字以成文,《元经》大义,于是深矣。”^{[4]216-217}王通之所以将废贾后的功劳加在刘卞身上,是为了褒扬其忠于晋室,同时贬低张华的不作为。汪高鑫研究《春秋》的“直书”,认为在孔子看来,凡是符合纲常伦理道德的历史记述,即使它与历史真实不相符,也是直书。《元经》此例正好为这一论点提供了注脚——为凸显刘卞对愍怀太子之忠,王通将原不属于刘卞的事迹人为地加在了他身上。

《元经》卷八刘宋武帝“永初二年”书:“秋九月,晋恭帝为宋所灭。”薛氏传曰:“晋恭帝既禅位,封零陵王,宋使兵人杀之,书‘为宋所害’,此宋史与晋史异辞也。《元经》因晋宋二史成文,在晋安帝时,刘裕,人臣也,故书弑,所以贬乱臣之逆也。在宋祖之世,晋恭降为王,宋为君主,故书为宋所害,以哀前代非义而死,《元经》实伤之耳。虽伤之,亦必变文,所以明宋为君主,犹害人臣也。”^{[4]255}对于晋恭帝被害一事,《元经》明确指出其非义的一面,其实也是强调晋宋“禅让”

背后的武力胁迫因素。

另外,《春秋·隐公元年》开篇就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对此解释称: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8]6-12}。

《公羊传》认为“王正月”体现的是大一统的观念,而《元经》在每年记述下,必书“帝正月”,即使此年正月并未记录任何事件,其正如《穀梁传》对“王正月”的解释那样:“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元经》薛传亦称:“正月虽无事,必书首月,《春秋》之法也。”这也是《元经》对《春秋》的模仿和比拟。

《元经》最初以经的面貌存在,旨在阐述作者王通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因而,王通在编写《元经》时,将自身的价值标准和历史观念融入其中。尤其《元经》本就是对照《春秋》体例和史法撰写的一部经典,其书写方式也多模仿《春秋》,并继承了《春秋》以史为法的历史思维。这也是《元经》的一大写作特色。

三、《元经》的史料价值

《元经》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因长期以来人们重视纪传体而轻视编年体,加之《元经》及其作者的真实存在性曾饱受争议,同时学界缺乏对《元经》的整理与研究,使得《元经》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学界普遍认为,《元经》采晋宋二史而成,记事十分简练,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李小成提出,“作为一部史书来说,《元经》并无多少特色,甚至可以说记事平庸,亦有不完整之处”^[9]。把《元经》与《晋书》对比,可以看出《元经》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史料价值:

1. 保存了一些《晋书》所没有的史料。如《元经》卷一西晋惠帝“元康二年”书:“冬十一月,沛国雨雹,伤麦。”^{[4]214}《晋书》卷四《惠帝纪》曰:“是岁,沛国雨雹,伤麦。”^{[10]92}《晋书》中并没有记载“沛国雨雹”的具体月份,而《元经》则精确到十一月,可以弥补《晋书》之不足。又《元经》卷一西晋惠帝“元康三年”书:“冬十月,太原王泓薨,作互市。皇太子纳妃王氏,秘书监华峤卒。”^{[4]215}《晋书》卷四十四《华峤传》只记华峤死于元康三年^{[10]1265},未说明具体月份,而《元

经》则精确到十月,亦可补《晋书》之不足。

2. 可以与《晋书》互勘互证。《元经》成书于隋代,而今本《晋书》则是唐代官修,从创作时间来说,《元经》应早于《晋书》,故其于《晋书》具有一定的校勘意义。如《元经》卷二“永嘉七年”书:“永嘉七年春,帝正月,丁亥,聪弑帝,崩于平阳。”^{[4]223}《晋书》卷五《怀帝纪》:“(永嘉)七年春正月,刘聪大会,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聪恶之。丁未,帝遇弑,崩于平阳,时年三十。”^{[10]125}关于怀帝驾崩的日期,《元经》作“丁亥”,《晋书》作“丁未”。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永嘉七年正月丁丑朔,丁亥日是此月第十一日,本月并无丁未日,故《晋书》误。再如《元经》卷五“兴宁三年”书:“三月,壬申,葬哀帝。丙午,慕容恪陷洛阳。”^{[4]241}《晋书》卷八《海西公传》云:“(兴宁三年)三月壬申,葬哀皇帝于安平陵。癸酉,散骑常侍、河间王钦薨。丙子,慕容暉将慕容恪陷洛阳,宁朔将军竺瑶奔于襄阳,冠军长史、扬武将军沈劲死之。”^{[10]210}关于慕容恪攻陷洛阳的时间,《元经》作“丙午”,《晋书》作“丙子”。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兴宁三年三月甲辰朔,丙午为此月第三日,此月并无丙子日,故《晋书》为误。

当然,《元经》在编写的过程中为了宣扬王通个人的史观,对原本的史实用语作了一定的修改,我们也可以用《晋书》来校《元经》。笔者在这里侧重谈的是《元经》对于《晋书》的校勘价值。

3. 保存了一些与《晋书》不同的材料。《元经》中保存了一些与《晋书》不同的材料,由于现存材料有限,我们还无法判断其孰对孰错。如《元经》卷一西晋惠帝“元康五年”书:“十二月,凋兵器。司隶傅咸卒,有石生京师。”^{[4]215}《晋书·傅咸传》作:“元康四年卒官,时年五十六。”^{[10]1330}关于傅咸去世的时间,我们无从考证,《晋书》与《元经》在此问题上的矛盾,也难以解释清楚。又如《元经》卷一“元康六年”书:“元康六年春,下邳王晃薨。三月,彭城有流血三百余步。”^{[4]216}《晋书·惠帝纪》作:“三月,东海陨霜,伤丧麦。彭城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10]93}到底是“三百余步”还是“百余步”,我们目前无法判断。再如《元经》卷二“永嘉三年”书:“四月丁卯,太尉刘寔退老,积弩将军叛,奔于刘渊。”^{[4]221}而《晋书·怀帝纪》作:“三

月戊申,征南大将军、高密王简薨。以尚书左仆射山简为征南将军、都尉荆湘交广等四州诸军事,司隶校尉刘暕为尚书左仆射。丁巳,东海王越归京师。乙丑,勒兵入宫,于帝侧收近臣中书令缪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并害之。丙寅,曲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刘寔请老,以司徒王衍为太尉。东海王越领司徒。刘元海冠黎阳,遣车骑将军王堪击之,王师败绩于延津,死者三万余人。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夏四月,左积弩将军朱诞叛奔于刘元海。”^{[10][119]}关于刘寔请老和积弩将军反叛的时间,甚至朱诞的官职到底是积弩将军还是左积弩将军,《元经》和《晋书》的记载都不相同。类似的时间、人名、官名、爵号两者记载不同的还有很多处,孰对孰错,还须进一步考辨。

值得注意的是,《元经》作为一部经史著作,与正史相比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跟许多编年体史书一样,其内容记载过于简明。这是《元经》的一大特点,但并不是《元经》的优点。从史著的角度看,其材料的选取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其次,《元经》对史实的记录也存在一些错误之处,如《元经》卷一“永康元年”书:“冬十月,黄雾四塞。甲子,立羊氏为皇后。”^{[4][217]}而《晋书·惠帝纪》云:“冬十月,黄雾四塞。十一月戊午,大风飞沙石,六日乃止。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10][96]}关于立羊皇后的时间,《元经》作“十月”,《晋书》作“十一月”。查《二十史朔闰表》,永康元年十月己丑朔,此月并无甲子日,而十一月戊午朔,甲子日为十一月第七日。故立羊皇后应在永康元年十一月,《元经》的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又因《元经》缺乏整理,存在一些明显的文字讹误现象。如《元经》“永康元年”后一年仍记“永康元年”,此年本应为“永康二年”,因为这年四月其年号已由“永康”改为“永宁”,《晋书·惠帝纪》也称此年为“永宁元年”。《元经》作“永康元年”,显然错误。另外,《元经》中多次出现“巳巳”的干支记日方式,应是传抄书写错误。由此可见,为了进一步挖掘《元经》的史学价值,整理及点校工作有待推进。

在隋代以前,中国古代历史撰述的两大体例——纪传体和编年体,已日臻完善,尤其是纪

传体史书,经学者和官方提倡,更是日益成熟。相较而言,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则相对沉寂。然编年体和纪传体作为历史书写的两大体例,不管是在史料选取、编撰方法,还是史学作用与功效方面,都各有千秋。《元经》是王通《续六经》中的一部,《续六经》是文中子倾尽毕生心力撰写的六部经典。《元经》一书成书于隋代,是一部书写两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史书,其编撰特色明显,但由于历史上的争议,《元经》长期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编写体例来看,《元经》是研究编年体史书以及经史关系重要的参考资料;从叙述内容来看,《元经》虽取材于晋宋二史,但在某些方面已超越了正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目前,人们对《元经》史学价值的认识,以及对其史料的利用和研究,都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元经》的整理和研究。笔者认为,关于《元经》对于《春秋》的继承与拓展,以及《元经》与先秦典籍在思想、文学以及美学上的延续^[11]等问题的研究,都有深入挖掘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李正君,宋卫杰.《元经》真伪问题的古今争论[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4(3): 280.
- [2] 尹协理,刘海兰.王通评传[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143.
- [3] 胡克森.从《元经》看王通北魏正统的确立依据:兼评孝文帝的门阀制度重建[J].史林,2018(1):50.
- [4] 王通.汉魏丛书·元经[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 [5] 祝总斌.关于王通的《续六经》与《中说》[J].中华文史论丛,2015(2):271.
- [6] 王通.文中子中说[M].阮逸,注.秦跃宇,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 [7] 汪高鑫.中国经史关系史[M].合肥:黄山书社,2017.
- [8] 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12.
- [9] 李小成.文中子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4.
- [10] 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 陈望衡.《国语》中“美”的概念论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4):1.

责任编辑:黄声波